

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权家玉

(中山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关键词:西晋;行台;正统性;长安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4-0105-06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朝代的更替一直是以禅代形式来实现的,尽管这种更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武力为基础,但是说明了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皇权正统性的传递一直沿着未间断过的路线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朝代立国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西晋末年却出现困难,经历“八王之乱”的西晋政权已是满目疮痍,随后又遭受异族蹂躏,中原已是混乱不堪。偏安江左的晋元帝虽然在混乱中得以自保,由于与中原的相对脱离,在继承中原皇统问题上出现了困难。东晋政权的建立,是中原大族与江东大族的联合,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辱,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1]。而在西晋末年的混乱之中,晋元帝是如何实现司马氏皇权正统从中原向江南迁移的过程呢?在中原相继建立的临时政府中,拥立的司马氏宗王,有明确记载的2个太子世系(图1)。琅琊王睿之世系为:宣帝—琅琊王伧—琅琊王睿。由此可见,琅琊王睿在司马氏宗室中颇为疏远,因此在中原武帝各近枝纷纷自立时他并没有染指皇权的机会。

宣帝—文帝—武帝 { 清河王遐—豫章王端 (荀晞太子行台)
吴王晏—愍帝邺 (荀藩太子行台)

图1 司马氏宗王的2个太子世系

一、3个太子行台的建立

琅琊王司马睿在司马氏宗室中血缘相对较为疏远:琅琊武王伧为宣帝司马懿之子,元帝为伧之孙,琅琊恭王觐之子,在西晋诸王中不具备称帝的优势。“琅琊王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立定基业,并非他有过人之才华,在众王之中,他并没有显得特殊……亦并非他分封时拥有甚大的兵权,在诸司马氏中,他不如八王中任何一王的实力”^[2]。他出镇扬州乃出于王导之策,《晋书·元帝纪》载:“东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3]。尽管这是其走向称帝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但就其政治地位而言仍然只是东海王越势力的分支:“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

收稿日期:2009-07-08

作者简介:权家玉(1980-),男,安徽寿县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

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4]。在西晋政治中地位不算显赫、血缘较为疏远的琅琊王睿，也就注定了其称帝道路的不易，尽管此前他已经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称帝之政治基础已经建立，但这一过程他仍然不得不精心筹划。

经历“八王之乱”的西晋政权分为以下几股势力：安居江东的琅琊王睿、盘踞山东的荀晞、地处幽冀王浚、占据洛阳的东海王越、远居关中的南阳王模和惨淡经营晋阳的刘琨等，他们相互之间都处于彼此脱离的状态。洛阳的怀帝政权被刘聪等消灭之后，便造成了皇统继承上的混乱。随后，中原地区前后建立了荀晞、荀藩、王浚等3个太子行台暂时行使中央权力的状况。

永嘉五年（311）洛阳失陷之后，西晋的皇统到此呈现暂时无主的状态，随之而来就是洛阳政权的剩余官僚死里逃生后，在中原各地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建立了行台，作为行使权力的临时政府。考虑到正统性和号召力，每一个行台都必需具备2个条件：必须有洛阳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时必须拥有血缘较近的司马氏宗室。

最先建立的是居于洛阳东面的荀晞行台，这一临时政府寿命较短，其建立以尚书令和郁和豫章王端为基础。《晋书·荀晞传》载：“豫章王端及和郁等东奔晞，晞率群官尊端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自仓垣徙屯蒙城，（王）讚屯阳夏”^[3]。和郁于洛阳时官居尚书令，而荀晞所居之职亦极高，《晋书·荀晞传》载：“会越薨，盾败，诏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增邑两万户，加黄钺，先官如故”^[3]。根据其本传，先前其所居之职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东平郡公。这在西晋政府的武将中，其职位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所拥立之豫章王，亦是诸临时政府中最具正当性之宗王。《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豫章王端，太子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荀晞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置行台”^[5]。豫章王端乃晋怀帝太子诠之弟，在中原3个太子行台中，数其与洛阳政府的血缘最近，在怀帝与太子同时被俘的情况下，他的正当性是无人能够质疑的。

行台于仓垣建立后，匆匆之间只对荀晞授予了职位，随后即迅速迁往蒙城，据考察此蒙城应为蒙县，其位置约在今河南商丘东北，阳夏则在今河南太

康。在蒙城西南，荀晞将大将王讚安置于此，明显已做好了防御的措施。这时的荀晞是华东一带仅存的一股较强势力，以豫章王端之贵，以荀晞之强，本可以在此稳定发展。但似乎最初就遇到了经济问题，《晋书·怀帝纪》载：“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3]。有“屠伯”之称的荀晞不擅绥抚，闾亭之事更使其内部关系趋于紧张，《晋书·荀晞传》载：“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行政苛虐，纵情肆欲，辽西闾亭以书固谏，晞怒，杀之”^[3]。再加上其他不利条件，遂使这股势力的内部趋于崩溃，使得石勒的进攻遂如摧枯拉朽。“由是众心稍离，莫为致用，加以疾疫饥谨，其将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阳夏，灭王讚，驰袭蒙城，执晞，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3]。而这个行台随着荀晞的被俘而烟消云散。《晋书·怀帝纪》载：“（永嘉五年）九月癸亥，石勒袭阳夏，至于蒙县，大将军荀晞、豫章王端并没于贼”^[3]。据《晋书·怀帝纪》，洛阳陷落在六月，荀晞行台也建立于六月，至九月被灭，持续3个月左右。

其次是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的行台，这一行台直接导致关中愍帝政权的建立，然而其发展轨迹极为曲折。洛阳沦陷后，荀藩、荀组兄弟出奔密县，并在此建立行台，其时间据《晋书·怀帝纪》记载也应在六月。对于荀藩兄弟建立行台的过程，各处记载相对较为散乱，兹在此撮而叙之。《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荀）藩与弟组、族子中护军崧，（华）荟与弟中领军恒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琅琊王睿为盟主”^[5]。荀藩兄弟出逃的路线恰有迹可循，《晋书·怀帝纪》云：“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奔轘辕，太子左率温畿夜开广莫门奔小平津”^[3]，则荀藩兄弟最初出奔轘辕。《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司空荀藩在阳城……”^[5]。据《中国历史地图集》^[6]，轘辕在洛阳东南，缙氏县以南，再向东南即为阳城，密县恰在阳城东面，约荀藩兄弟行至阳城而傅祗建台，其后继续向东至密县。

荀藩兄弟到达密县后即建立了行台，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行台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所需条件并不具备。荀藩为洛阳政府的司空，位居三公之一，荀组亦居司隶校尉、特进、光禄大夫，其他诸如荀崧、华荟、华恒等人位望不高。但这一机构缺少建台的最重要条件——司马氏宗室，故只得传檄天下以琅琊王为盟主。行台居于密县，而所奉之主远居建邺，密县行台遇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推举者与被推举者

并不属于同一股势力,且二者相互独立。

正是这个行台让琅琊王在中原混乱的局势中有了一席之地,授予他一个颇具号召力的身份——盟主地位,但并未尊其为太子,至少在荀藩危急时奉琅琊王为准帝王号令全国是不合适的,其原因自然仍是出于血缘的考虑。尽管当时在混乱的中原局势中,避难江东是一个潮流,《资治通鉴》卷87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难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5]。在中原士人大规模南下时,司马睿借此不断壮大自己,但在建立行台和继承皇统上琅琊王在位望和血缘上不具备条件,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所以密县行台虽未尊其为太子,仍使他在位望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这一行台并未停滞于此,秦王业的到来使它有了新的动向。《资治通鉴》卷87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抚军将军秦王业,吴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许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阎鼎,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拥众,用鼎为豫州刺史,以中书令李矩、司徒左长史彭城刘畴,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等为之参佐”^[5]。秦王业到达密县恰恰补充了密县行台所急缺的条件。作为吴王晏之子,晋武帝之孙在血缘上亦不为远,与荀藩等人的位望遂形成天然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是荀藩的外甥,更使这一行台浑然天成。密县行台的主体即是荀氏一门,行台于是抛弃了琅琊王睿而改奉秦王业,即后来的愍帝。据《资治通鉴》卷87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此事也在永嘉五年六月,那么琅琊王的盟主地位持续时间之短可想而知。

由于缺乏可以依靠的武力,行台在接到秦王后迅速南下至许昌,在此地吸收地方武装,其中实力最强大的要数天水人阎鼎。《晋书·阎鼎传》载:“初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转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遭母丧,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以密近贼,南趣许颍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暉、太傅参军驍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皆来赴畴。玆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3]。相对于阎鼎的武装,刘畴的势力相当薄弱,这就直接导致这个行台被阎鼎控制、裹挟迁往关中的事件。《晋书·愍帝纪》载:“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藩、组等同谋奉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涂复叛,鼎追杀之,藩、组仅而

获免。鼎遂挟帝乘牛车,自宛趣武关,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于蓝田”^[3]。对于此事记载,《晋书·阎鼎传》又有不同:“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见杀,唯顗、述走得免”^[3]。《资治通鉴》卷87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的记载与此同,这一行台在吸收阎鼎后,遂完全被关中势力控制,最初成员在迁往关中途中被杀或逃走,全部退出。《晋书·荀组传》载:“愍帝称皇太子,组即太子之舅,又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事,与藩并保荥阳之开封。建兴初,诏藩行留台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3]。

据《晋书·愍帝纪》,秦王称皇太子在永嘉六年九月辛巳,此前他已经到达长安。《稽古录》卷13载:“(永嘉六年)春,司空荀藩奉武帝孙秦王子业入长安,立为太子”^[7]。这里明显存在一个错误:荀藩并未跟随行台进入长安。愍帝称皇太子已是到达关中之后的事了,而荀藩兄弟退出行台后遂滞留于开封。由密县行台树立的旗帜——秦王业被阎鼎夺走而插在长安,最初的行台演变为留台,成为长安政权辖下的没有丝毫权力与实力的空机构。

最后就是盘踞幽州的王浚建立的皇太子行台。据《资治通鉴》卷87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秋,七月,王浚设坛告类,立皇太子”。《考异》曰:《晋书》初无其名,刘琨《与丞相版》曰:“浚设坛场,有所建立,称皇太子”,不知为谁。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封拜,备置百官,列署征、镇,以荀藩为太尉,琅琊王睿为大将军。浚自领尚书令,以裴宪及枣嵩为尚书,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5]。据考察,唯独王浚行台所立之皇太子姓名全无,宋时司马光就已无法考证这一问题,《晋书》对此记载亦极为模糊,“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3]。这时在东北的宗王势力较少,“八王之乱”后处于最北面的即是居于邺城的新蔡王腾,却并没有分支进入东北的记载。王浚久欲自立,《晋书·王浚传》载:“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讖,谋将僭号”^[3]。他很有可能最初并没有获得司马氏宗室,而只是空立名号,为自己的僭立作铺垫,故其影响极微,很容易被忽略。这一行台在最初建立时将中原残存系统全部纳入,委以官号,所以其以正统自居的意图极其明确。幽州行台建立后直到建兴二年(314)三月为石勒攻破,一直未有进展,既不能号召晋阳之刘琨,在石勒灭荀晞后,完全孤悬在外,

其所控制之范围亦仅限于幽州界内了。

在这3个行台之前，尚有傅祗于河阴建立的行台，未立皇太子，其影响力一直较小。《晋书·傅祗传》载：“大将军苟晞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祗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3]。对于其建立整个过程，《晋书·怀帝纪》云：“大将军苟晞表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潘）滔，不敢奉诏……”^[3]。《资治通鉴》有更详细记载：“苟晞表迁都仓垣，使从事中郎刘会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人、谷千斛迎帝……（怀帝）乃使傅祗出诣河阴，治舟楫，朝士数十人导从”^[5]。正是这一次，怀帝很明显欲迁都并依靠苟晞。这个行台最初是傅祗和苟晞共同建立的，推举的盟主为傅祗。此行台居于河阴，在洛阳西北，黄河岸边，约在今孟津以北。苟晞势力远在青兖徐一带，很难依靠。所以这一行台最初就陷入窘境。傅祗官居司徒，但因无宗王在手，乃不得不自立为盟主，这直接影响其号召力，苟晞在六月建立了行台，傅祗行台遂不具备任何权威。《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六年条载：“（永嘉六年五月）聪使河内王粲攻傅祗于三渚，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会祗病薨，城陷，粲迁祗子孙并其士民二万余户于平阳”^[5]。此行台终于在黯淡中结束了。

洛阳于永嘉五年五月沦陷，中原先后出现3个太子行台，时间相互交错，基本处于并置的状况，各以正统自居，又多被其他势力掺入甚至控制，西晋司马氏之皇统到这时遂一片混乱。《晋书·郗鉴传》载：“时苟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3]。而在皇权正统的争夺中，保江南一隅的琅琊王睿未能获得一席之地，正统的观念丝毫没有向江南发展的趋势。随后苟晞、王浚等相继灭亡，各临时政府相继陨落，皇位遂为辗转进入关中的秦王业所继承。局势并未停留于此，到了长安失陷、愍帝被俘时，于是局面出现了彻底的改观，琅琊王迎来了自立的曙光。

二、关中失陷与元帝称帝形势的最终形成

中原同时建立了3个太子行台，以琅琊王睿为主的扬州军府却不具备条件，首先它没有洛阳政府的高官支持，据《晋书·元帝纪》，他最终从洛阳政府获得的名号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这只是武职，并且建邺的军府与洛阳的分离较早，

“（永嘉元年七月）己未，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5]。晋元帝经营江南从这时（307）拉开序幕，与洛阳政府一直处于半脱离状态，所以其军府中无人任职于洛阳。

苟藩等在密县建立行台时出现转机，琅琊王一跃成为盟主，《建康实录·晋上》载：“永嘉五年夏六月，刘曜寇洛阳，京师沦陷，怀帝蒙尘于平阳，司空苟藩移书天下，推琅琊王为盟主”^[8]。尽管很快被取消，但他仍利用这一机会将江南的异己势力扫清。此前他在东海王越的支持下剿除了扬州都督周馥，《晋书·元帝纪》载：“（琅琊王）受越命，讨征东将军周馥，走之”^[3]。此时他利用此机消灭了江州刺史华轶和豫州刺史裴宪，《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及睿承苟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长吏，轶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扬州刺史王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兵败，奔安成，访追斩之，及其五子。裴宪奔幽州”^[5]。江南地区遂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但面对正统性他仍然一筹莫展，遂不得不接受长安政府授予的左丞相官号。《资治通鉴》卷88晋愍帝建兴元年条载：“（建兴元年五月）壬辰，以琅琊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5]。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虽然在建康收罗人才，所授官号却尽为扬州督府之僚佐或州佐，并无僭越迹象，而中原3个行台所授官号均为中央重职，在称帝道路上琅琊王不敢越雷池一步。

至建兴四年（316），局势出现转机，刘曜攻破长安，俘虏了愍帝。此前中原的司马氏宗王已被逐个消灭，苟晞所立行台于永嘉五年九月被攻破，南阳王保也于长安城破当年病逝，《晋书·南阳王保传》载：“愍帝之蒙尘也，保自称晋王。时上邽大饥，士众窘困，张春奉保之南安。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于刘曜……是岁，保病薨，时年二十七”^[3]。司马氏所剩之宗王皆居于江南，虽江南非琅琊王睿莫属，然而皇权正统性的承接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早已被长安政权抛弃的开封留台这时解决了其合法性问题。《晋书·荀组传》载：“及西都不守，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劝进”^[3]。留台这时是长安政权遗留的唯一机构，“俄而藩薨，（愍）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明年，进位太尉，领豫州牧、假节”^[3]。荀组官号太尉，位居三公之首。作为长安政权的分支，虽然作为一个空机构，其号召力有限，但这一推举仍为琅琊王登基提供了一个台阶。

开封留台与关中一直保持半脱离的状态,要保证皇统承接的完整性,仅有荀组的支持是不够的,它不能延续皇权传递的一脉相承。这就需要居官于长安的人能将长安的正统携至江南,平东将军宋哲遂应运而生。《晋书·元帝纪》载: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诏:“遭运迍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诣丞相,具宣朕意,使掇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3]。此道诏书对琅琊王的称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西晋的皇统由长安向江南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没有改朝换代的前提下,陷落政权的遗诏往往是继任政权最为权威的旗帜。

这封遗诏值得怀疑,考《晋书·愍帝纪》中有关宋哲的记载,约略可以看到此前他的一些活动:“(建兴)三年,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建兴四年)八月,刘曜逼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国难……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建兴)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庚子,虹霓弥天,三日并照。平东将军宋哲奔江左”^[3]。

据考证,刘曜进攻长安时,宋哲由华阴西入关中,所谓“内外断绝”,长安被围,诸路勤王之师皆作壁上观,那么宋哲等人并未进入长安直到京师陷落,诸人如鸟兽散,这样宋哲何以得到愍帝的传位诏书?并且《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条记载又有不同:“(建武元年)春,正月,汉兵东略弘农,太守宋哲奔江东。(胡三省注云:‘哲屯华阴,汉兵自长安东略,故弃城来奔’)”^[5]。据此,宋哲并未领兵赴长安之难,那么此诏书遂成空穴来风。晋元帝尽管保据江南,帝业已成,但在皇统继承上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尽管其离帝位咫尺却仍有鸿沟,正统性是他必须跨越的一道障碍。

对于愍帝的诏书,似乎尚有其他反证材料,黄门郎史淑等带往凉州的诏书,《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建武元年条载:“朕已诏琅琊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琊,共济多难”^[5]。似乎在此诏书的对应下,前一诏书确信无疑了。然而又有可疑,《晋书·张寔传》载:“于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是岁,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3]。据考证,前凉张氏称建兴年号自建兴五年至建兴四十九年十二月(317~361),并未接受东晋年号。张

氏在保据河西时,最初并无称帝之心且孤悬在外,即使认同江东年号亦无法实现对其挟制,即在其权限上并无损害,却迟迟不用江东年号,史料关于史淑之诏书与张寔之推崇的记载,其可信度就值得商榷了。

宋哲的诏书在琅琊王称帝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分量,它完成了西晋皇权正统由关中向江南迁移的过程。即使没有宋哲的出现,在这一历史趋势下也会有一个替代者,诏书保证了皇统传承的完整性,其本身的可信度还在其次。正统的皇权从此在江南遂一代代通过禅代的形式传承,历数百年没有出现推翻皇权另立朝代之事。

琅琊王睿于建兴五年称晋王,终于重新走上了称帝的道路,并于次年正式称帝。尽管关中尚有南阳王保,《晋书·张寔传》载:“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并且在次年也称晋王,“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叛,氏羌皆应之”^[3]。关中局势在长安失陷后已成戎狄疆场,南阳王保这时并无稳定的依靠力量,自存已不可能,在帝位竞争上自然不能与琅琊王相比,于同年病逝。

琅琊王睿于建武元年(317)称晋王,次年称帝。但由于中原混乱中琅琊王因为没有获得传国玉玺而使其皇位的正当性仍受怀疑。《南齐书·舆服志》载:“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南”^[9]。东晋虽然以中原正统自居,玉玺却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拿到。《资治通鉴》卷99晋穆帝永和八年条载:初,谢尚使戴施据枋头,施闻蒋干求救,乃自仓垣徙屯棘津,止干使者求传国玺。刘猗使缪嵩还邺白干,干疑尚不能救,沉吟未决。六月施帅壮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给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玺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在吾所,信卿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干以为然,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枋头。(胡注云: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板天子”。传国玺至此归晋)^[5]。由此可以看出,戴施此次北行的目的在于传国玺,东晋自元帝建鼎江南到此才真正将帝业正统完整地移往江南。

三、结 语

在西晋末年洛阳失陷、中原丧乱之时,西晋的皇统在中原一分为三,其中比较具备权威的有2个:荀晞的蒙县行台和荀藩的密县行台。随着局势的发

展,晋室皇统移往关中。这期间晋元帝由于在洛阳政权中的地位较低,在血缘关系上又相对疏远,遂不得问鼎。直到关中政权覆没,中原诸王被尽数消灭才真正走上称帝的道路,实现司马氏皇统的南移。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 毛汉光.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 [3]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 [7] 司马光. 稽古录[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 [8] 许 嵩. 建康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Process of the legality's delivery between the Two Jin Dynasties

QUAN Jia-yu

(School of Humanit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end of West Jin Dynasty, the Rebellion of Eight Princes leads to the collapse of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situation in central plains falls apart 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 and five minorities rebellion in China. Ministers of former government support Sima family's princes to set up provisional governments – Xingtai one after another, and they all take themselves as legality. Although King of Langya gain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emperor, he still has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legality, which is unknown by the King under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the author researches his goal and finds that the time after the upheaval of West Jin leads the imperial power delivery to short-term chao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legality move to the south lasts for several years.

Key words: West Jin Dynasty; Xingtai; legality; Chang'an

(上接第 78 页)

Towards a dynamic multianalysis of literariness

LU Min-hong^{1,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Literarines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literary studies, including the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Ye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ines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because the factors of it have never been accepted in balanced ways. This paper aims at making clear of the basic factors of literariness and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literary studies. It first exposes the deficiencies of formalist and deconstructive literariness. Then,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poetics” and “conditional poetics” by Gerard Genette,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a more rational perspective on literariness should be dynamic, many-sided and open, in which all the factors function in their own way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iltrate among one another, and any isolated factor is surely too weak to work.

Key words: literariness; “constitutional poetics”; “conditional poetics”; discourse feature